

《水浒传》英雄主义新论

蔚 然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水浒传》在明代就曾与《三国演义》被合刻为《英雄谱》。相对于《三国演义》中正统的救世济民的英雄主义,《水浒传》体现的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市民阶层思想观念的影响更深,倾向于以自我为核心,最大化追求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特点,呈现出有悖于传统英雄观的新特征。

关键词:水浒传;英雄主义;自我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26-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06

On the New Heroism in *The Water Margin*

WEI R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JiLiang University of China,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18)

Abstract: *The Water Margin* and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have been printed as *YingXiongPu* in the Ming dynasty. Compare to the heroism of lineal "saving" thought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heroism in *The Water Margin* has reflected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t had deeper influence by citizen's ideas, inclined to selfishness and maximized the benefits of the spirit and material. The new opposite fe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hero ideas has been assumed in *The Water Margin*.

Key words: *The Water Margin*; heroism; self-worth

《水浒传》在明代就曾与《三国演义》被合刻为《英雄谱》,“《三国》《水浒》二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1]。可见,其共同之处是塑造“智勇忠义”的英雄群像。相对于《三国演义》中帝王将相式的英雄,《水浒传》的英雄则更多来源于下层社会,其身份囊括农民渔夫、市井商贩、屠夫刽子、下级官吏等等。因而,《水浒传》体现的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市民阶层思想观念的影响更深。与《三国演义》中正统的救世济民的英雄主义相比,《水浒传》中的英雄倾向于以自我价值为核心,具有最大化追求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特点,呈现出有悖于传统英雄观的新特征。清代王望如对宋江的分析足够深刻:“宋江豪滑大侠,草泽亡赖,生当盛时,必不郁郁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禄,自不至犯上作乱而为盗。最可异者,世人将钱买官,宋江则将钱买

盗。将钱买官者,事发治以盗之罪;将钱买盗者,事发加以官之名。若论时宜,公明何其得计也。”^[2]宋江胸怀大志,怎奈出身低微,若循常规,注定一生不能出人头地,但其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渴求使其“必不郁郁居人下”,所以,只能选择由盗而官的捷径。宋江是很大一部分梁山好汉的缩影,不切实际的野心与抱负促使他们选择非常规的途径,这是《水浒传》英雄主义的新特征。也有学者持另外的观点,“文人赞颂水浒,主要感慨其英勇孔武”。^[3]下面,笔者就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珍惜生命是英雄主义的坚定基石

梁山好汉们虽然斗争时不畏艰险、勇猛向前,但生死攸关的时刻总是无条件地选择珍惜生命。他们并不是一味愚莽,而是见机行事,保全性命,“文死

收稿日期:2017-02-12

作者简介:蔚然(1972—),女,内蒙古卓资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谏,武死战”等传统名节观念对他们并没产生太大的影响。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模式——“招供”,就是有力的佐证。严刑拷打之下“招供”的情形在多个被俘好汉身上都出现过,小说在叙写这类情节时,语言几近雷同,形成了模式化的表述。例如,智取生辰纲之后,白胜被官府捉拿拷打,“白胜又捱了一歇,打熬不过,只得招道:为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来纠合白胜,与他挑酒,其实不认得那六人。”^[4](第17回)柴进因李逵打死殷天锡,亦被屈打成招,“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第51回)李逵被罗真人戏弄,落到蓟州马知府手里,“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了,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第52回)卢俊义被梁中书拷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熬不过,伏地叹道:果然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第61回)戴宗给蔡知府下假书信,被发现疑点后,“把戴宗捆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戴宗捱不过拷打,只得招道:‘端的这封书是假的。’”(第39回)英雄们虽然铁骨铮铮,但并不愚腐,在性命与名节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对生命的珍惜。武艺高强如卢俊义,性格暴烈如李逵,竟然无一例外地选择有辱名节的“招供”作为权宜之计。另外,那些家世显赫、身居要职的如呼延灼、秦明、关胜等朝廷将领,战败被梁山好汉俘虏后,无一不选择归顺投降,宁可先冒不忠不义之名等待以后朝廷招安,而不是选择以死殉节。

同时,遭遇灾难走投无路之时,好汉们同样是出于对生命的眷恋,绝不逞一时之气,而是忍辱负重苟活于人世。如杨志丢了生辰纲之后,“话说杨志当时在黄泥冈上,被取了生辰纲去,如何回转去见得梁中书?欲要就冈子上自寻死路。却待望黄泥冈下跃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寻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第16回)鲁智深打死镇关西之后,自己寻思,“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第2回)看到担了人命官司,选择逃跑。梁山好汉对生命的珍惜远重于对名节的珍视,这也是

市民意识赋予英雄的新特质,令读者耳目一新。

二、追求人格自由是英雄主义的核心

掀开梁山聚义序幕的是林冲,而林冲的经历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所以,“逼上梁山”说一直在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种情况在梁山好汉中并不多见,不能以一概全。笔者通过详细统计,归纳出一百单八将落草为寇的动因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被官府或权豪逼上梁山。这种情况正符合我们通常提到的“逼上梁山”的含义。此类人物本是顺从法律、受社会道德约束的本分之人,但不幸的是,他们遭遇到了特权阶层的无理迫害,并且依靠公理或个人努力都无法解决。因此,在性命不保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反抗道路,公开站到官府的对立面。真正符合这一标准的在一百单八将中只有林冲、解珍、解宝3人,也即他们3人才符合“逼上梁山”的情形。

第二,触犯法度为躲避官司而落草避难者,共21人,分别是晁盖等8人劫生辰纲,鲁智深、杨志、武松、雷横、孔明、孔亮、杨雄、石秀、王英、石勇、邓飞、孟康、裴宣杀人避祸。同样是为了避难,其与上种情况的区别是,这类好汉触犯法度的主观动机比较强,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挑战。例如晁盖,本有庄园田产,却不安于现状,主动劫取巨额财富,最后被官府追捕而只得落草避祸。再如杨雄、石秀,遭遇问题时并不信任官府,曾向官府提起诉讼。由于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武力,所以手刃仇人而后快,最终欣然落草为寇。这类人实质上是不满于社会规则,主动向社会挑战。

第三,搭救、包庇或结交罪犯盗匪而受牵连,从而走上落草为寇的道路。这种情况共26人,分别是史进、宋江、柴进、曹正、施恩、花荣、李俊、童威、童猛、薛永、张顺、穆弘、穆春、戴宗、李逵、朱富、李云、杜兴、宋清、乐和、顾大嫂、孙新、孙立、燕青、蔡福、蔡庆。许多研究者也注意过这一现象:“柴进作为封建显宦,怎么有那么大的兴趣和犯了弥天大罪的江湖人士混在一起?”^[5]他们在与盗匪交通之时便清楚知道将承担怎样的风险,但仍然义无反顾,其实也是包含了主动向社会挑战的决心。

第四,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梁山好汉对于自己倾慕的或对山寨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就想方设法诱其入伙,甚至不惜采用所谓的“绝户计”,

断人后路,使其再无生存余地,不得已上梁山落草为寇,也就是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这类也有11人,分别是朱仝、卢俊义、李应、徐宁、秦明、侯健、金大坚、萧让、安道全、皇甫端、扈三娘。深受“绝户计”之苦的,除了最为典型的卢俊义,秦明也是其中之一。“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总管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第33回)为了实施这一计策,城外多少无辜百姓被梁山好汉杀死,而秦明全家妻小也被青州慕容知府所杀。宋江这段话,无疑是对“绝户计”的最好诠释。梁山好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径,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比统治阶层对民众的迫害更为逊色。

第五,朝廷官员在征剿梁山作战时被俘投降,共有15人,分别是黄信、呼延灼、韩滔、彭玘、凌振、关胜、郝思文、索超、单廷珪、魏定国、张清、龚旺、丁得孙、宣赞、董平。

第六,流落江湖向往占山为王的生活,主动寻找机会落草者,共有12人,分别是王定六、焦挺、时迁、汤隆、段景住、杨林、张青、孙二娘、燕顺、吕方、郭盛、欧鹏。例如时迁听说杨雄、石秀要投奔梁山,便说:“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了?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第45回)另外,还有2个特例就是李忠和郑天寿。此二人先流落江湖卖艺,后分别落草桃花山和清风山,最后共同聚义上梁山。

第七,作品中没有交代原因,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啸聚山林,或依水打劫。这批人也达19人之多,分别是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朱贵、李立、张横、蒋敬、马麟、陶宗旺、邹渊、邹润、樊瑞、项充、李衮、鲍旭、郁保四。

另外,梁山好汉啸聚山林之前的社会身份,严格意义上为农民的只有陶宗旺1人,有37人为官吏,13人为地方富户,14人经商(开店或做小本生意),3人为渔夫,2人为猎户,1人为道人,3人为秀才,5人有一技之长,29人本来就闲荡江湖或不明原因以剪径为生。正如天都外臣所言,“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狙僮舆台,粉黛缙

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6]

通过对梁山一百单八将情况的细致分析,不难看出,好汉们落草为寇,与其说是“逼上梁山”,还不如说是主动反抗社会的结果。对此,金圣叹早就做过评价:“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7]他们遭遇压迫时,不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以获得自由,如手刃仇人或劫狱劫法场等方式;有的人甚至还不满足于现状,主动向社会挑战,追求理想化的自由。他们身上洋溢着澎湃昂扬的英雄激情,争取个人权利时不依常法,希冀凭借自己的武力重建社会秩序。而啸聚山林正是他们冲破现实束缚、实现抱负的最简洁的途径。因此,“逼上梁山”的说法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同时,35%的朝廷官吏与12%的富户,占据了梁山好汉中过半人数。这批属于社会特权阶层的人参与造反,并不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而这更说明英雄们追求绝对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

三、满足物质欲望是英雄主义的指向

《水浒传》中,“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是众多好汉上梁山的初衷。这句浅显易懂的口号寄托着他们力图摆脱现实生活的困窘与制约,希望能够无限制地满足物质欲望的纯朴理想,这也是他们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最朴素的原因。戴宗劝石秀入伙,“去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第43回)朱贵劝朱富入伙,“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第42回)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物质欲望,所以好汉们对于金钱都格外看重。作品中多处出现“英雄爱财”的描写,例如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蘸血在墙上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真乃英雄行为,豪气冲天,但随后就“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几件在怀里。”(第30回),只因这些酒器都是银器皿。杨雄在翠屏山杀妻之后,“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裹里了。”(第45回)杨雄丝毫不顾惜潘巧云的生命,但对她那几件尚值几两银子的首饰却分外珍惜。李逵杀死李鬼之后,接着就进房里搜寻,“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李逵都拿去了,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都打缚在包裹里”(第42回)。又如,吴用说服“三阮”劫取生辰

纲,也特别强调金钱带来的快乐,“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第14回)。

正因为众多江湖好汉看重钱财,所以客观上金钱还能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于是“疏财”就被视为“仗义”的同义词了,也成为一些佼佼者树立威信的习惯手段。晁盖能够江湖闻名,就是因为“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第13回)宋江亦是“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谷馆,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第17回)柴进大名远播,也是因为“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但有来投奔他的,他必尽力资助。他们满足了那些流落江湖好汉的物质需要,这种慷慨行为也被绿林作为衡量人格的基本原则。

《水浒传》中,不论物质欲望使好汉们放弃琐碎的常规生活落草为寇,还是物质为一些豪杰赢得美名,都是从两个侧面体现了英雄们对物质的强烈渴求。

四、弱肉强食是英雄世界的生存法则

首先,我们来分析《水浒传》中以强凌弱的正义呈现现象。在普通百姓心目中,英雄必然要具备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品质。但《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英雄观,更关注他们是否具有凌驾众人之上的足够的勇力,而不是正义的品质。哪怕强悍到可以恃强凌弱,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

(一)“夺山寨”情节模式对“恃强凌弱”的诠释。《水浒传》中描写好汉们为了给自己争得一方立足之地,最常用的办法便是以强凌弱,以武力强取自己看中的山寨,哪怕这个山寨早已是其他豪杰的属地。因此,小说中“夺山寨”这一情节模式应运而生。最初的“夺山寨”情节,就是始于群雄在刀光血影中争夺水泊梁山。晁盖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无处可去,吴用听说梁山泊“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第17回),决定投奔梁山。可是原有首领王伦并不接纳他们,吴用便计激林冲火并王伦,晁盖才做得一山之主,从此占据梁山。随后,杨志和鲁智深走投无路时,听说青州的二龙山地势险要,“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唤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唤作宝珠寺,那座山生来却好,裹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上得去。”(第16回)便决意夺取下来作为安身立命

之所。二龙山原来的头领邓龙自然不是他二人的对手,其在争夺过程中被杀,杨志和鲁智深便抢占山寨占山为王了。另外,邓飞、裴宣所占的饮马川,被戴宗赞叹“山沓水匝,真乃隐秀”,事实上也是邓飞他们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这里屯扎,后被我们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第43回)从“夺山寨”这一情节模式可以看出,英雄的法则是非常规的,他们膜拜武力,强者为王,勇者为胜,恃强凌弱就是英雄公认的法则。

(二)滥杀无辜是恃强凌弱的恶性延续。如果说“夺山寨”还局限于英雄对有抵抗实力的反对者的打压,而滥杀无辜则是对欺凌弱者的非人性延伸。三打祝家庄时,扈家庄扈成已投降,并绑了祝彪送给宋江,但遇到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宋江问他活捉俘虏有几个,李逵说:“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第49回)李逵的自豪与宋江的纵容,体现了英雄们对无辜生命的不尊重。宋江为了诱朱全上山落草,把朱全带出去看灯的小衙内杀了,“朱全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第50回)为了成就英雄大业,最无辜的小孩都可以成为牺牲品。但小说对此类行为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谴责,这反倒成为烘托英雄性格的常用的表述手段。而且,滥杀无辜不是个别行为,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常态。攻打大名府时,节级蔡福提醒柴进:“‘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第65回)梁山好汉攻城之时并无任何首领考虑过无辜百姓的遭遇,小说叙写屠城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也丝毫没有贬低好汉们英雄豪气的意味。

(三)对恶行的欣赏。恃强凌弱发展到极致,便是对弱者痛苦的漠视。《水浒传》描写好汉杀人时,往往对恶行细节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似乎非此不足以表现英雄的豪迈情怀。

宋江怒杀阎婆惜,“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额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第20回)杨雄杀潘巧云时,“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

脏,挂在松树上。”(第45回)如此残忍的行径,作者却以细致的表述、欣赏的口吻来衬托英雄的霸气与豪气。小说中还经常有吃人心的详细描写。黄文炳被抓后,“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第40回)甚至还有对烹制心肝的经验之谈。宋江被王矮虎抓住后,“王矮虎便道:‘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掇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第31回)小说对这一恶行的描写不仅没有丝毫避忌,还充满兴致地把吃人心的心得经验娓娓道来,这无疑是对任人宰割的弱者肆意的凌践,是受到强权鼓励的性恶的恶性膨胀。

其次分析梁山政权的权力倾轧现象。啸聚山林的生存法则,就是能者为先,而梁山好汉的最高目标,便是山寨头领这一位置。一百单八将中,具备争夺首领资格的只有晁盖与宋江了。因此,小说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并没有回避他们的权力斗争。

“领袖是不需要盖世武功和超卓智慧的,他们只需要具有独一无二的人格——让天下英雄归服的领袖人格。”^[8]晁盖从劫取生辰纲到火并王伦,以及经营早期的梁山大业,一直能够让众人臣服,因而居于首领之位。但自从宋江落草之后,宋江的威信越来越压过晁盖,其中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不排除蓄意的权力倾轧。宋江上山之后,每当遇到冲锋陷阵的事情,总是不畏艰险,首当其冲。这一方面出于他对梁山大业的热忱,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收买人心做好铺垫,并逐渐把晁盖架空。晁盖并非畏惧艰险之人,宋江入伙之前,他曾经多次涉险,亲自带兵下山做出种种壮举,包括江州劫法场救宋江,都是身先士卒。但是,宋江上山之后,就把晁盖定位为坐镇山寨的高高在上的符号式的首领,并阻止晁盖下山。例如,攻打祝家庄时,晁盖说:“我亲领军马去洗荡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可是,宋江第一次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第46回)面对这样的恭维与定

位,晁盖一定接受得心安理得。可接下来,宋江似乎不想再给晁盖冲锋的机会。当得知柴进被陷高唐州时,晁盖提出要亲自下山救柴进,“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可是宋却以同样的理由进行阻拦,“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第51回)同样,孔明在青州被呼延灼所虏,孔亮去梁山求救,晁盖说:“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再次拿出同样的理由,“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第57回)紧接着,鲁智深与史进被陷华州,晁盖大惊,同样提出自己亲自下山去救,“既然两个兄弟有难,如何不救?我今不可耽搁,便亲去走一遭。”宋江并不打算给晁盖机会,“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轻动,原只兄弟代哥哥去。”(第58回)此时,宋江已不用太多的解释,“原”表现了本该如此,已形成惯例,不需异议。打徐州芒砀山时,“宋江听了,大怒道:‘这贼怎敢如此无礼!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第58回)此处小说没有提及晁盖的反应,似乎已经没有他争取的余地。晁盖对宋江的排挤并非没有知觉,因为每次宋江舍命下山搭救兄弟,就会换来别人对他的过命交情,还有建功立业的光环。作品中也多次提到山寨中人几乎都是宋江的心腹,例如,吴用劝宋江做山寨之主时说,“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言。”(第59回)于是,在攻打曾头市时,晁盖不想继续忍让了,他的决心坚定而悲壮,“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第59回)晁盖自知机会不多,所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结果过于急功近利,忽视一些明显的破绽,出师未捷身先死。晁盖临终前对宋江留下遗言,“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第59回)他在弥留之际才决心公开违拗宋江的心意(贤弟莫怪我说),以独特的方式阻挠宋江登上第一把交椅,其中充满了对宋江的反感,也是权力斗争中失败者的最后哀叹。《水浒传》对待晁、宋的权力斗争的描写是非常客观冷静的,并没有肤浅地流露叙述者的主观倾向,可见其对权力倾轧也是造就英雄的方式之一的认同。

(下转第35页)

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征文接收地之一为陆氏的家乡杭州,另一地点则为南京,收启人是林季芳和汪复初,林氏和汪氏无疑是陆云龙的刻书合作者。《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的一个评选人何伟然也在南京,他为前书写序落款是“书于金陵客园之问西阁”。林季芳不可考知,而汪复初与何伟然两人是明末南京著名书坊主。陆云龙和他们也许开始是科场上的考友,结社酬和,切磋时文,后来又同为落第文人,惺惺相惜,结成生意场上的伙伴。他们跨区域的生意合作可使其充分利用资源,拥有更多的市场。在通讯、交通非常落后的四百年前,陆氏兄弟书坊的跨地域连锁经营让人感到惊诧。陆氏崢霄馆跨地域经营刊刻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也是陆云龙刊刻的书籍被江苏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比陆云龙家乡浙江省图书馆反而还多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中晚期的江南,随着商业的进一步繁盛,通俗小说已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像陆云龙兄弟这样的书坊主在小说编创传播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两种角色:小说编创中,其常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匡世济民的说教者,其抄录邸报,把小说标榜为有助于社稷的正史;但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陆氏兄弟却是洞彻市场行情,注重选材、包装、连锁营销的明书商,在他们的编创刊刻活动中,射利动机比“补世”心态恐怕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冯保善.论明清江南世情小说出版的小说史意义[J].明清小说研究,2015(1):83-97.
- [2]顾克勇.清夜钟作者非陆云龙考[J].上海大学学报,2006(4):150-152.
- [3]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0.
- [4]陆敏树.陆蛭庵先生家传[A].清康熙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5]余继登.典故纪闻影印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881.
- [6]吟啸主人.古本小说集成近报丛谭平虏传·风传奴书缚督师[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顾克勇.辽海丹忠录的材料来源及编创特色[G]//廖可斌.明代文学论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560-571.
- [8]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7,54.
- [9]陆云龙.古本小说集成魏忠贤小说斥奸书[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0]陆人龙.古本小说集成辽海丹忠录[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1]王群英.型世言中的晚明世相[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23):217-218.
- [12]许军.刘永福系列时事小说的版本演变[J].明清小说研究,2016(1):58-74.
- [13]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雕版印刷源流[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385.
- [14]徐一茗.明清小说插图设计中构图的视觉隐喻研究[J].明清小说研究,2016(1):38-48.

(上接第30页)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英雄主义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在市民意识的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丰富了英雄主义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雄飞馆主人.刊刻英雄谱缘起[M]//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73.
- [2]王望如.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M]//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97.
- [3]胡以存.南、北支水浒故事与《水浒传》成书[J].明清小说研究,2015(3):70-83.

- [4]施耐庵.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2.
- [5]杨大忠.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研究中的问题[J].明清小说研究,2016(1):91-104.
- [6]天都外臣.水浒传叙[M]//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62.
- [7]金人瑞.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G]//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50.
- [8]熊明.宋江:反抗道路思考的人格化呈现[J].明清小说研究,2015(4):154-169.